

我永远的老师何泽慧先生

马宇蓓

永远的老师

我与何泽慧老师的直接接触始于三十多年前，上世纪 70 年代，但已经记不清是在哪一年了。1974 年，我因高能物理上马，从甘肃的长庆油田调到高能物理所，开始从事接近我专业学科的科研工作。那时我已 30 岁，从事宇宙线学科的科研工作才刚刚开始，我满腔热情，寻求着一个尽快切入的方式，以弥补岁月带给我的延迟。

1976 年，我接了一个太阳耀斑 X 射线探测的任务，并初次接触到宇宙伽马暴的研究课题。1976 年“四人帮”打倒后不久，百废待兴，迎来了 1977 年国家规划自然科学发展的春天，宇宙线室也不例外，规划着新的宇宙线天体物理的发展方向。当时，何泽慧先生任高能所副所长，我不记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认识了她，什么时候一个什么样的具体任务——是因为 1976 年的任务，还是因为 1977 年的学科规划——必须要到图书馆查阅文献。何先生先带着我到了小小的高能所图书馆，然后又约我去中关村的中科院图书馆。两天后，我骑着自行车到了院图书馆，何先生已在那里等我，她带着我把图书馆的期刊室、过刊室、图书室、资料室等一间一间、楼上楼下地走了一遍。她告诉我如何查阅图书资料，那些我们常用的杂志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天文和天体物理期刊那里停的时间最长。从那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进图书馆、查资料成为我科研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何先生站在院图现刊室外搭着我的肩膀给我介绍情况的那一幕永远成为一个定格，只要想起这件事，脑中便会重现当时的影像。

何先生曾经是高能所图书馆购书的义务咨询员，她对图书的熟悉和热爱，非一般人可比。她家不大的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半个多世纪，潮涨潮落，中国的社会和科学发展走过曲折的道路。成绩是举世公认的，而其中求实和原创精神的失落也开始被注意到。在反思中，一位人文学者说过：“有

房间里，一面墙都是图书，有更好的房子分给她，她不去，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怕把她的书搞乱了。我认识她至今的三十多年内，她从未搬过家。她曾放许多书在宇宙线室的天体楼里，我们室原来曾开出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维持，她为此对我很不满意，提出了批评，她把她的藏书全部、无条件地赠送给了科大研究生院图书馆。如果说藏书、买书是为了读，这个道理人人皆知，但是保存书籍资料是为了备查的，未必都能像何先生这样重视和坚持。受何先生的影响，我知道书的价值，所以我们曾开放藏书室，允许室里的科研人员自由选取，因此，有些当时藏书室的书，至今还能从各个科研组办公室的书架上看到。

永远的热情

何先生对科研工作和从事科研工作的年轻人，有一种永远的热情。现在才想明白，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年过六旬，不可能在科研的第一线，然而她对宇宙线室的发展和支 持却始终如一，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我脑海中可以复现的另一个定格画面，是我们最开始在香河发放气球时她几乎每场必到的场景。她积极参加所有相关的学术活动。1996 年，全国宇宙线会放在云南大理召开，那次会议是我国宇宙线研究领域所有老工作人员到得最多、最齐的一年。其间，何先生多次提出要去东川看一看当年的宇宙线观测站，要去参观云南大学与香港大学合作的梁王山宇宙线观测站。后因大家担心她年事已高，一再劝阻，她拗不过大家，才不得不放弃。

永远的童心

何先生的童心是出名的，所里认识她的人从不同事情、不同角度都能体会到她的执著、简单和快人快语。自从进入 20 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在有幸受到何先生教诲的 30 多年中，我的脑中曾多次浮现出这样一句话：

我们有何泽慧！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00049）

本文原载于 2009 年 3 月 5 日《科学时报》

乐。她想做的事，很是执著，她不愿做的事，有时甚至很固执，八抬大轿也请不动；她的生活极其简单和朴素，然而她十分快乐，与她在一起的人都可受到她的这份快乐的感染。我想，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她的童心，一位科学家对待生活和科学问题的一颗永远不老的童心。

2000年的秋冬，我们陪同何泽慧先生一起去酒泉卫星发射场基地，那时神舟二号飞船正在作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在那里，从她与发射场的司令员的对话中，我才知道，何泽慧先生曾提出要做航天员，她说自己个子小，符合做航天员的条件。这个话题在那两天不止一次提起过，为此，司令员们还答应安排她去参观一下航天员们受训练的地方。我们大家都把这当做说着玩儿的。后来，我和她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劝她不要再提此事，我说何先生你真是有这想法吗？这是不可能的。她说，为什么不可能。我说这太危险了，您这么大岁数了，不会让你去的。她说，不是有危险吗？正因为我岁数大了，我去做这个实验才更合适。我立刻语塞无言，何先生的童心里还包含着她对生命的理念。

1996年，我们在大理开宇宙线会时曾游苍山，室里一位年轻人在山上为她找到一根树棍做拐杖，

树棍长短粗细都像一根拐杖，没有手把，但当时很有用，她很喜欢那拐杖，回北京时要带走它，留个纪念。但是到了昆明的飞机场，这根拐杖不能随身带，解释是，拐杖可以随身带，棍子不可以。我再三解释老太太正拄在手上，一样的大小粗细，为什么就不能当做一根拐杖放行？但还是不行。何先生不放弃，我硬是加办了托运手续，把这棍子托运到北京。这是我有生以来托运过的最轻最小的“行李”，何先生在机场的固执，和办托运时工作人员的不解的表情，也在我的大脑中形成了活动影像的定格。到北京后，何先生在行李大厅一直等，直到那根带着行李标签的“棍子”出现在传送带上才拿上离开。我问何先生为什么，何先生说，他们不让带，我就非要带，看他们给不给我运过来。我终于明白了何先生的童心，原来较劲的地方已经不是这棍子本身了。

时值何泽慧先生95周岁寿诞之际，我有机会在此撰文，写上生活工作中的两三件事，以表我对何先生的敬意。何先生是我永远的老师，过去，现在，将来，一日为师，终生为师。祝老人幸福、健康、长寿。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00049）

本文原载于2009年3月5日《科学时报》



科苑快讯

盲视现象首次得到实验证实

有一部分失明者不用摸索就能感知面前的事物，比如主动躲避障碍物、感知他人的肢体语言等，这种现象称为盲视。科学界对此解释不一：有的认为是残存的视觉皮质区仍有功能，有的认为视觉信息可通过其他途径（无需经过初始视觉皮质区）在脑中传递和处理，有的认为无意识的视觉信息可影响语意的处理和运动功能，还有的认为盲视现象的实验报告根本不可信。

荷兰提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Tilburg）的德盖尔德（Beatrice de Gelder）和同事首次对此进行了实验。他们在越障碍训练场放置了一些盒子和椅子，结果发现实验对象不用手杖就避开了这些障碍物。而且还能分辨他人的恐惧、愤怒和喜悦等面部表情。

德盖尔德说：“研究说明，这种演化而来的能力非常重要，可帮助失明者在现实世界中生存。”

（高凌云编译自2008年12月23日 www.upi.com）

封面照片说明：

2008年9月26日，49岁的瑞士飞行员伊夫·罗西依靠绑在背上的喷气动力飞行翼，成功飞越了35千米宽的英吉利海峡。这是一项长达十年的研究成果，飞行翼翼展2.45米，操控起来非常复杂；飞行者的身体就是机身和方向舵，通过转头、弯曲身体及改变脚的姿势等动作来调节方向。飞行翼的骨架由碳纤维制成，外层包裹玻璃钢，内部有一个电控单元、线缆，两个装有航空煤油的燃料罐。目前罗西正在研制新型飞行翼，以实现让普通人也能像鸟儿一样在空中自由飞翔。

（大博/文）